

YEHUO WENCONG

ZHISHI

WENREN



FRANSHI

野·火·文·丛

# 最是文人

胡文辉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 最是文人

藏书

胡文辉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是文人/胡文辉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0. 4  
(野火文丛)  
ISBN 7-5396-1906-6

I. 最… II. 胡…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5023 号

最是文人

胡文辉 著

---

责任编辑:沈小兰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合肥晓星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5.625

插 页:2

字 数:140,000

印 数:5000

版 次: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906-6/I·1783

定 价:38.80 元(本册定价:8.20 元)

---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 录

## 自由心史(一)

- 自由主义知易行难 ..... 1
- 回去,是为了现在!  
——读《旧人旧事》 ..... 5
- 走了的与未走的 ..... 9
- 橘 颂 ..... 13
- 读陈寅恪,想钱钟书 ..... 16
- 虚经腐史意何如  
——陈寅恪诗《经史》补释 ..... 26
- 陈寅恪诗中的“田巴” ..... 34

## 自由心史(二)

- 钱钟书与中国文史之学 ..... 36
- 寂寞沈从文 ..... 45
-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偶记 ..... 52
- 冯友兰的境界 ..... 56
- 引无数文人竞折腰 ..... 61
- 梁漱溟的勇气 ..... 64

如果周作人早死,而鲁迅长寿 .....	70
鸟头与红鼻	
——读《故事新编》偶记 .....	74
鲁迅与《古史辨》	
——《鸟头与红鼻》补说 .....	79
争夺鲁迅	
——关于重编《鲁迅全集》的争论 .....	82

## 时事论衡

丑闻与民主 .....	94
克林顿与尼克松 .....	97
谁的喉舌 .....	100
大字报与互联网 .....	103
顾城杀妻案 .....	106
克隆新世界 .....	109
地球最大的节日 .....	113
“为双方加油!” .....	116
面对富豪 .....	119
三个毛泽东 .....	123
抵抗集体遗忘	
——关于咸宁千校 .....	127

## 读书杂志

“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 .....	129
敦煌学与爱国/民族主义 .....	133
重估敦煌遗书之外流 .....	137

中国知识分子的鸦片 .....	140
1984 爱人同志 .....	143
索尔仁尼琴的两重角色 .....	149
自由书	
——读《美国读本》 .....	154
商业化阴影下的传媒 .....	157
“不公正的法律根本不是法律” .....	159
几本中国书 .....	161
几本外国书 .....	163
读书眉批四则 .....	165
后 记 .....	169

# 自由心史(一)

## 自由主义知易行难

一个幽灵，自由主义的幽灵，在知识界徘徊。

这首先表现在近年的出版方面，包括两类：

一、对自由主义经典的译述和探讨。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自由与繁荣的国度》(冯·米瑟斯)、《重申自由主义》(德·雅赛)、《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商务印书馆的《论自由》(密尔)、《自由主义》(霍布豪斯)，三联书店的《自由秩序原理》(哈耶克)；三联书店出的丛刊《公共论丛》(刘军宁等编，已出三辑)，实际上也是打着经济学的幌子，出售自由主义的秘药。

二、对中国自由主义往圣先贤的追溯。最热门的似有三人：**胡适**——现代中国最著名的自由主义者，甚至被称作“中国的自由男神”，仅他的评传就有很多种新作，如白吉庵的《胡适传》、欧阳哲生的《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胡明的《胡适传论》、沈卫威的《无地自由·胡适传》和《自由守望——胡适派文人引论》等(海外的余英时曾指出：大陆

知识分子对胡适的新热潮，正表明自由主义的政治观念对今天的中国还是有意义的)；陈寅恪——陆健东的《陈寅恪最后二十年》一时纸贵，“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名言洋洋盈乎耳，另有清华大学出版社的《吴宓与陈寅恪》、《陈寅恪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等多种；储安平——四十年代后期国共大决战之际，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周刊左右开弓，坚持自由主义立场，为当时舆论重镇；谢泳对储安平及《观察》周刊作过专门研究，他在随笔集《旧人旧事》(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学人今昔》(长春出版社)中都有相当多的述评。

此外还表现在报刊方面：如《二十一世纪》1997年8月号有“九十年代自由主义”专论(汪晖、徐友渔、许纪霖)，《粤港信息日报》周末版1998年1月9日有“关注自由主义”专版，《大时代文摘·读书之旅》接连有“自由主义纵谈”……

可局限性也是明显的。毕竟，探讨自由主义的理论，并不等于真正提出自由主义的主张；追寻自由主义的传统，也不等于真正参与自由主义的实践。因此徐友渔就认为：自由主义在今日中国还谈不上思潮和运动，甚至谈不上有自由主义者。也就是说，中国目前的自由主义，只是书面的自由主义。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

民国初年，孙中山一反“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古训，提出“行易知难”的力行哲学，以期中国人民统一思想，服从领袖，克成大业；二十年代末，国民党借“行易知难”之名，行思想专制之实，胡适针对此弊，批评孙中山，又提出“知难，行亦不易”……到世纪末的今天，检讨历史，回顾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浮沉，我们不能不承认，还是古语说得对——自由主义，是知



易行难。

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可以说既不深奥，也不新鲜。在西方，自17世纪下半叶开始，由古典自由主义（个人的自由主义），到修正自由主义（集体的自由主义），再到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兴（哈耶克、波普、伯林是伟大的代表），已经历了从右到左再到右的思想轮回，即使是中国，自由主义在二十年代、四十年代也曾盛极一时。1948年8月，正值国民党大厦将倾、自由主义无地藏身的前夕，胡适发表《自由主义是什么？》，大意说：“自由主义的最浅显的意思是强调尊重自由”；自由主义最重要的政治意义有两点，一是“统治权必须操在多数人民的手里”，二是“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自由权利”，“多数人的统治是民主，而多数人的政权能够尊重少数人的基本权利才是真正自由主义的精髓”；现代自由主义的含义还应包括“和平改革”，反对暴力革命。在此之前，胡适更在《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的广播中大声疾呼：“……那民主自由的趋向，是三四百年来的一个最大目标，一个最明白的方向。最近三十年的反自由、反民主的集团专制的潮流，在我个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波折，一个小小的逆流。我们可以不必因为中间起了这一个三十年的逆流，就抹煞那三百年的民主大潮流、大方向。”余英时在1990年曾就此评论：“1989年东欧社会主义的全面崩溃、苏联的遽速变革，再加上……的民主运动竟证实了他在四十二年前的观察，胡适似乎成为一个‘伟大的先知’了。”

在中国，在整整半个世纪以前，自由主义的理念及其未来命运，就已被如此清楚地指出来了。这就是自由主义的知易。

至于自由主义的行难，我们可以举出二十年代末的《新月》与“人权”事件，可以举出四十年代末的《观察》周刊被封事

件，可以举出五十年代末台湾的雷震与《自由中国》事件……但我更愿意举最为时人艳称的陈寅恪为例。陈寅恪并非一个标准的自由主义者，他是纯粹学人，从未以自由主义相标榜，对自由主义也未必有太深入的了解，他只是(!)坚守了作为一个学人——作为一个人——的基本自由。1953年底，陈的弟子汪篔奉命南下，劝陈寅恪赴京就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提出两个条件：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泽东)或刘公(少奇)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朋友劝他不必如此，他说：“我要为学术争自由。”陈寅恪的不可及处，不在于他所坚守的东西(哪个知识分子不知道、不希望“学术自由”?)，而在于他的坚守本身——在那个连“沉默自由”也没有的时代！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其思想可及也，其勇气不可及也！相比之下，那些标准的自由主义者又如何呢？罗隆基、王造时、储安平等等，当时身居庙堂之高，反倒三缄其口，甘作神州袖手人……(1957年，他们还是竞相“鸣放”了，终究不失自由主义者的本色，结果被一网打尽，划为右派。)

自由主义的知易行难，其实就是知识分子的知易行难。自由主义的困难，不在于缺乏理论，而在于缺乏实践；而知识分子的问题，也不在于缺乏认识，而在于缺乏勇气。自由主义在中国湮没了近五十年，这历史的命运，决非天生温柔的知识分子所能抗拒的。可是，近五十年之后，当历史的秋千正自左右荡回来的时候，知识分子，尤其是负天下名的知识分子，难道不应承担起他们可以承担的责任吗？

对知识界，我的简单意见是：**多实践些自由，少谈些理想！**

## 回去,是为了现在!

——读《旧人旧事》

谢泳是我写信认识的。当时在《二十一世纪》上看到他写的一篇《〈观察〉撰稿人的命运》，很有兴趣，于是冒昧寄了自己的一篇文章给他看，并问他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文章。谢泳便寄来一本自费印刷的《禁锢下的呐喊——1978—1989年的中国报告文学》和一组谈几个著名知识分子的杂感。《禁锢下的呐喊》是他1989年写出来的，这以后他就转到现当代知识分子的研究方面了。

最近，他又寄来一本新出的《旧人旧事》，大多是对现当代中国知识界一些人与事的感想，包括他原来寄给我看的若干篇。谢泳的文字，笔端融入感情，但又从容不迫。我最喜欢的还是谈现代知识分子、谈《观察》周刊、谈西南联大的那些，他对当前知识界的某些意见，是我不大同意的。

谢泳在《自序》和《过去的教授》那一篇中都提到：邵燕祥先生曾对他说，他们年轻的时候，很少想十几年前的事，不像现在的年轻人这么容易怀旧。谢泳是1961年出生的，像他这样长在红旗下的年轻人，何以会怀恋自己未曾经历过的那些“旧人旧事”？谢泳自己说：“想来想去是过去比现在有值得回忆的东西吧。……这可能是对现实的另一种评价，也可能是一种对未来的无望，过去的事总能唤起他们的另一种情感。”

在我看来，邵燕祥先生那一代人年轻时不怀旧是很自然的。五十年代，正是光荣与梦想的岁月，正是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岁月，一穷二白，好写最新最美的图画，亿万人民都在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上飞奔，谁会怀恋那万恶的旧社会（除了那些躲藏在阴暗角落的阶级敌人）？当然，也会经常提起过去，但那不是为了怀旧，而是为了忆苦思甜。

至于我们这些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怀恋过去似乎也不难理解。以前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回到现代》，里面说：“……‘回到现代’却完全是一种可能的、而且是理所当然的趋势，……因为我们现在重新自觉追求的种种人文价值——民主、科学、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人格独立等等——都不能不回溯到‘现代’。”现在想来，年轻人的所谓怀旧，其实正是这种“回到现代”的渴望。这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怀旧，而是一种历史的追溯，一种重建的愿望，我们怀恋的并不是过去本身，而是过去的“情境”，我们神往的也不是现代知识分子本身（书中有一篇《遥想教授当年》），而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状态”。我们潜在的思路是：如果现在能像那个时候，如果我们能像他们，那该多好啊！

那本是一个万方多难的时代。可是，与后来相比，那却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乐园。

在《张东荪这个人》这一篇中谈到：《观察》周刊在四十年代末有过一次“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讨论，张东荪认为政治自由主义已经过时，他主张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同时又坚持“文化上的自由主义”。他说：“中国接受西方文化虽只短短将近五十年，然而却居然在思想界文化界中养成一种所谓 liberalmind。此字可译为‘自由胸怀的陶养’，乃是一种态度，或

风格，即治学、观物。与对人的态度或性情，亦可说是一种精神。”当时有不少人忧虑政治的变局将使知识分子失去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张东荪却奇怪地乐观：“因为我始终相信人类的知识一经开放，便无法退回到蒙蔽的状态。中国在这数十年中既然已养成这样的自由思想的风气，谁也无法再压倒下去。所以我们的任务还是如何把它发扬光大，总要比现在更自由些。对自由风气的不能保全，却不必担忧。”可惜曾几何时，历史就已证明张东荪错了，大错特错。他的学生叶笃义回忆：张东荪解放后从来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中共建党三十周年大庆的时候，叶笃义劝他写一篇，“他还是不写，他说他要保持他的‘沉默自由’。……我再三相劝，他才勉强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四句七言打油诗来搪塞。”

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失乐园。

重提旧事，又想到近几年知识界讨论得不亦乐乎的“人文精神”问题。我不大清楚“人文精神”的确切涵义是什么。但我觉得，作为一种知识分子的理念和信仰，“人文精神”至少不能不有一个根本的前提——自由主义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在“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的环境中，哓哓高谈什么“人文精神”或“理想主义”，又能有多少意义呢？提倡“人文精神”也罢了，所谓“人文精神失落”的提法，却显然是一种历史错位。如果说我们曾经有过一种“人文精神”的话，那它的失落，决不是在“改革开放以来”，而是远在近半个世纪以前了。现在有不少青年批评家，包括谢泳，对王蒙抱有相当的敌意，但我以为王蒙对“人文精神”的批评确是切中要害的。“压根儿没有的，上哪儿失落去？……或曰，是五十年代思想改造时期失落的，不是现在失落的（按：我很同意这种看法）。……失落

了四十余年，没有谁说过失落，就是说连失落也不许说，现在终于可以大谈特谈失落了，是不是说明市场经济的发展终于使人文精神有了一点点回归了呢？”是的，现在不是失落，而是回归，是重建，是复兴，尽管还只是一点点。

我们需要重建现代知识分子的传统，一种曾经建立起来的、但又早已失落了的传统——自由主义的传统。自由主义不是什么新思想，它只是一种“常识”。但我们最需要的，却不是那些五光十色的新思潮新理论（什么“后现代”、“后殖民”、“后国学”啦，什么“新理想主义”、“新民族主义”、“新左派”啦），我们最需要的就是确立这样一种陈旧的常识，让这种常识落到实处，重新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在什么地方失落的，就要回到那个地方拾起来；在什么时候失落的，就要回到那个时候拾起来。

套用董桥的话说：回去，是为了现在！

---

谢泳《旧人旧事——一个年轻人眼中的过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智者心语丛书”。

## 走了的与未走的

很遗憾，也很惭愧，我还从未读过张爱玲的东西。

而张爱玲却已随风而逝。

9月15日，星期五，本地各大周末报纸同时刊出了张的死讯（而作为传媒“主旋律”的三大报在正式新闻中却没有报道）；9月8日下午，美国洛杉矶警方在加州大学一间公寓内发现，现代中国著名小说家、被誉为“旷代才女”的张爱玲已在一张地毯上孤独地逝去多时了。

张在四十年代的上海红极一时，“享受着灿烂夺目的喧闹”；而如今撒手之际，竟无一人相送，唯有青蝇为吊客。

张死得很寂寞，但并不凄惨。据悉死者面容安详，是在睡梦中无疾而终。生如夏花之绚烂，死若秋叶之静美，又有何憾？

真正凄惨的是另外一个人。

《羊城晚报》港澳海外版在第五版刊登了张爱玲的死讯，而在第八版恰巧刊出一篇不大引人注意的短文（华田的《一位女小说家》），主要内容是说：当年上海曾有一位女小说家，名叫施济美，与张爱玲齐名。她在五十年代还以“梅寄诗”（施济美的倒装谐音）写过东西。参加创作会时总是夹紧尾巴，敬陪末座，请她发言，总是说“我是来学习的”，就不再说话。文革初

期，她与同宿舍的另一位女教师在受到批斗以后，打开煤气，双双“自绝于人民”。

我从未听说过施济美这个人。施济美不但活得卑微，死得悲惨，而且身后萧条，无籍籍名，这更是无法与张爱玲相比的。

如此相近的两个人，如此不同的两种命运与遭际。

这其实不仅仅是她们两个人的命运。我们的历史曾经分裂，遍体鳞伤，至今难以复原。她们的命运也就是两种历史的命运。

她们后来的遭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的一念之差：走，还是不走？

结果施济美未走，而张爱玲走了。张于1952年自上海去香港，1955年移居美国。然后就有了她们两人不同的生，不同的死。

由走了的张爱玲，未走的施济美，不禁又想到另外两个人——走了的胡适，未走的陈寅恪。他们两人同属现代中国最杰出的学者之列。

胡适1949年去了美国。随后大陆掀起了惊涛骇浪般的批胡运动，集中了全国知识界的力量向“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头子胡适”开火，加诸胡适的恶谥无所不用其极，“西崽”，“文化汉奸”，“美帝走狗”，“国民党代言人”，等等等等。相形之下，胡适后来在台湾虽亦遭到“围剿”，但到底被引为上宾，高居中央研究院院长之位。1962年胡适猝亡，其葬礼更是极尽哀荣。胡适一生坚守自由主义的立场，在现实的政治中完全是失败了，但他个人的成就和声望，却达到了一个知识分子所可能达到的极致。

陈寅恪本来也可以一走了之，但他却没有走。



与胡适不同，陈几乎两耳不闻窗外事，是一个书斋中的纯学者。他于1948年受胡适之请，乘机飞离已被解放军围困的北平，1949年辗转到广州。但他这时已是六十衰翁，双眼视力又几乎全失，已不堪浪迹萍踪，再作天涯羁旅，遂止步不前。当时傅斯年一再急电催促他赴台，而他终于未走，自此长作岭南人。五十年代陈颇受礼遇。1953年当局邀陈赴京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陈以气候不适为由婉拒。1958年历史学界开展“厚今薄古”运动，陈所在的中山大学历史系对他展开批判。文革期间，年近八十的陈备受冲击，助手被逐，护士被撤，房屋被占，存在银行的工资、存款被冻结——陈申请每月动用存款四十元以作补充营养和雇请工友之用，亦被拒绝（这叫“不准反动文人养尊处优！”）。陈还被迫写了六次书面“交待”，对家人称“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大约1967年间，陈给他的夫人唐筭预撰挽联曰：“涕泣对牛衣，廿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辞意悲切之极。1969年，陈死于心力衰竭和肠梗阻。

陈寅恪生于1890年，比胡适早生一年，反比胡适晚逝七年。可是死者无知无痛，而生者凄凄惨惨切切，正应了周作人的那句话：寿则多辱。

同样是走，同样是不走，于是又有了各自的世界，各自的命运。

走了的只是少数，张爱玲，胡适，黄鹤一去不复返。未走的总是大多数，施济美，陈寅恪，欲采苹花不自由。

走，还是不走？这是一个问题。

不，这曾经是一个问题。

写于1995年9月16日